



周恩来

周恩来
1966-1976

安建设 / 编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ZHOU ENLAI
DE
ZUI HOU
DE SHIYUE
1966-1976

1966-1976

安建设 / 编著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 1966 ~ 1976 / 安建设编著 .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3.12

ISBN 978-7-221-11517-1

I . ①周… II . ①安… III . ①周恩来 (1898 ~ 1976) —
生平事迹 — 1966 ~ 1976 IV . ①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4985 号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 (1966~1976)

Zhou Enlai de Zuihou Suiyue (1966~1976)

编著 安建设

责任编辑 陈荣 张静芳

执行编辑 张洪雪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199 千字 印张 19.5

ISBN 978-7-221-11517-1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谨以此书纪念周恩来诞辰 115 周年

暨献给为新中国毕生奋斗的老一辈革命家们

大国宰辅——功勋卓著，流芳百世

为党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年动荡——忍辱负重，苦撑危局

艰难主政——殚精竭虑，不辱使命

中共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前任领导人 评价“文革”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陈云）

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叶剑英）

周恩来同志在长期斗争中，同党内党外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建立了亲密的感情。尤其在十年动乱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如同“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减少政治损失，维持经济生活，保护广大干部，支持正义群众，改善对外关系，等等。周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李先念）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我们历尽磨难，终究幸存下来，而周恩来同志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堪以告慰的是，周恩来同志在“文革”中千方百计地保护下来的一大批战友和同志，继承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未竟事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杨尚昆）

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都同周恩来同志的辛勤工作分不开。（江泽民）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胡锦涛）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代序）

李琦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度过的。在党和人民陷于深重灾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撑危局。

现在的中青年朋友也许已很难想象“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甚至认为有些事情是荒唐而不可思议的。有人往往会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周恩来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等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而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研究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一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他对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决不让步和妥协，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它。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人也好，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永远记取。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周恩来在内。尽管最初对有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可是仍以为它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料。在广大群众特别是一大批青年中，已经形成一股狂热的无政府主义思

潮，来势凶猛。周恩来曾试图纠正青少年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他深知这绝非轻而易举能奏效的，只能根据条件和可能，采取独特的如鲁迅所说的韧性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方式。“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强调对群众运动必须“因势利导”。可以肯定，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选择的方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需要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一位“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专家在对大量史料作了详尽的考察之后，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众场合批评各种错误做法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这也正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的缘由所在。此后，无论是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还是在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都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表现出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就周恩来而言，他一方面必须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适时地、恰当地对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全面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谅解他。毕竟历史为他留出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周恩来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这种情况，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立党为公、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维护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统一，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减少损失，为拨乱反正创造条件。如果党分裂了，国家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后果将不堪想象。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因为当时党还起作用，国家权力还起作用。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

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们历经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

周恩来自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一直处在斗争前沿、政治漩涡的中心，历尽千难万险。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又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但是，身为党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国务院总理，他还担负着保障七八亿人民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难以想象的重任。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人民共和国仍须保持她独立自主、不容欺侮的主权和尊严。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样的重担，周恩来没有逃避，没有退缩，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一种崇高且不无悲壮的信念，挺身而出，拼死一搏。正是这种纯洁、坚定、明确的内心动力，驱使这位年逾古稀、身患绝症的战士无私无畏，为党为国，奋斗不息。

叶剑英元帅有一句诗：“最艰难处显奇才。”周恩来置身“文化大革命”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他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正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感到陈云同志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评价是多么公正和深刻。试想，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作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帮”就有可能篡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将难有出头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

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不仅对历史，对现实也有密切关系。历史都是相联系的。只有深刻了解昨天，才能懂得今天，把握明天。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离不开研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很不够，需要继续加强。

目录

Contents

循循善诱，出以公心——在“红卫兵运动”中 / 1

周恩来对祖国后代始终抱着发自内心地关心、爱护和极端负责的态度。他利用和红卫兵谈话的机会，多次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家庭、个人经历、工作经验教训等情况，以切身体会来启示告诫青少年们：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年轻人犯错误是难免的，粉饰和掩盖错误是不对的，要勇于正视它、改正它。

“生产绝不能停！”——“文革”初期的国民经济 / 23

几个月来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了“革命”与生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就是为了让广大干部群众打消顾虑，以便放手抓生产、抓业务；同时，也是为了让那些一味煽动“革命”、“造反”，反对抓生产的人在基本事实面前无话可说。

怀仁堂的怒吼——1967年“二月抗争” / 45

一直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关系密切的周恩来，这时候承担的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与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们之间，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大雪压青松——在外交部“夺权”前后 / 65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外长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

终识庐山真面目——处理1971年林彪事件 / 103

林彪等人的背叛行径使周恩来怒不可遏。他用力按下手中的话筒，气愤地迸出两个字：“叛徒！”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毅然担起领导全党全军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重任。

“极左思潮一定要批透！”——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 125

“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在客观上宣告失败的必然反映。周恩来所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开始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不仅为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艰难而曲折的斗争，由此揭开了新的一幕。

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共和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 153

尼克松走下舷梯，将手伸向周恩来。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时，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研制“两弹一星” / 189

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恩来在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20多次专委会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

“这是将来中国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 / 203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于是，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芙蓉国里尽朝晖”——1974年“长沙决策” / 229

有关周恩来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直至周恩来去世数年之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作了“透露”。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鞠躬尽瘁，不辱使命——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 247

诚然，在当时环境下，四届人大仍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历史的局限性，这自然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所不能预料和超脱的。但是，毕竟这次会议冲决了重重障碍，战胜了主要敌人，取得世人瞩目的成果。正如一家外国评论所言：“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顶点”。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1975年“全面整顿” / 263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迅速、系统地纠正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错误，使各方面工作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也由停滞下降转入迅速回升。……这次全面整顿，深得党心、民心。历经8年动乱之苦的人们开始感到：“四化”有希望了，民族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

“文革”时期周恩来主要活动年表（1966—1976） / 283

循循善诱，出以公心

——在“红卫兵运动”中

“我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1966年夏秋，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爆发了一场“红卫兵运动”。这场运动，是在这一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全国的开端。

这时的党中央领导机构内部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由于中央领导核心的调整，在全会上受到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都已“靠边站”，原来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也已基本停止活动。不久，经毛泽东同意，又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将中央政治局会议与中央文革小组组合二为一，讨论党政业务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碰头会一般由周恩来主持。这样，周恩来便在实际开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周恩来这时所面临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持续达数月之久的“红卫兵运动”。

一、在“破四旧”风潮里

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发生了一件影响全国、震动世界的大事：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的几万名“红卫兵”，并与首都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他不久前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之后，进一步明确表示他对红卫兵的支持。8月18日这一天，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发端。

北京“八·一八”大会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组织几乎一夜之间就遍布了城镇乡村。这些以“红五类”出身为主体的青少年们，抱着“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红色政权”的神圣使命和真诚愿望，不再停留在学校里搞运动，而是冲出校园，走上街头，把